

人间

编辑：柳再义 (025)83279183
E-mail: jsgrb_liu@163.com

万象

男子讨回30万工钱全为1元5角

内蒙古的戈先生辛苦一年好不容易挣了点钱，可结账拿钱时他却犯了愁，放在他面前的30万元分别装在12个编织袋以及5个纸盒里，面额共分1元及5角两种。13日19时许，银行的工作人员经过2天加班加点，最终将这笔钱清点完。

戈先生最早拿到这笔钱是在12日上午9时许，为了把钱存起来，戈先生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打电话联系数家银行，却屡屡被婉拒。

“有的银行答复说办业务的客户多，银行人手不够，当日不能存储这么多小面额的人民币；有的银行则答复可以存储，但需提前预约，好让银行分理处或者支行安排人手，在不影响正常存储业务的情况下进行清点。”戈先生说。

12日15时许，戈先生终于在呼和浩特市金谷农商银行海东支行得到了好消息，他的钱可以存在这里。由于数额众多，海东支行的工作人员还抓紧联系了金谷农商银行青山支行的同事们一起帮忙。

在2所支行多名工作人员2天加班工作后，这笔钱最终在13日19时许被清点完。

“他们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真的很感谢。”戈先生激动地说。

“由于办理业务的客户较多，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能下班后加班清点。戈先生存入的全是零钞，我们不仅要清点钱数，还得逐张、逐枚分辨真假，因此只能手工点钞，但大家都很耐心。这件事情是对我们员工业务能力的考验。”金谷农商银行青山支行赵姓负责人说。

尚虹波



图为银行工作人员在清点零钞

揭秘

编辑：邹凌 (025)83279194
E-mail: 213ZL@sina.com

珍闻轶事

古人穿鞋为何不分左右脚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鞋子分左右脚，还是颇为另类的现象。分左右的鞋子，古代称为“运脚鞋”，古人是不穿的。在几千年的时光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左右。

左右不分的鞋子是不是很难穿？非也！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柔软。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是磨脚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尺码，只说鞋号，称“脚第”。

虽然鞋子不分左右，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相反。在古代，还有人也因左脚长而出名，如楚国的宰相孙叔敖，《荀子·非相篇》中便记其“长左”。

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鞋楦只有一只。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外亦然，西方鞋子分左右至今也不到200年的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中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诞生于1876年，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

不分左右的鞋子又叫“正脚鞋”，也叫“直脚鞋”。古人的鞋子为何不分左右？可能与古代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一的“鸳鸯鞋”有关。在古人眼里，两只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鞋”则被视为不洁，只有贱民才穿，这与现代前卫一族有意穿之，以显时尚，完全不同。

与官宦都有勾结之人在民间俗称为“黑白两道”，其来历便与“鸳鸯鞋”有关。古代鞋履等级区分严格，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连所穿鞋子的颜色都有严格规定。

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影响极深的北魏孝文帝曾在“服制改革”中即规定，鞋履的颜色“士卒百工无过绿、青、白；奴婢侍从无过红、青，犯者问斩”。而对做买卖的生意人，西晋朝廷则规定，凡市侩必须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这种鞋就是“鸳鸯鞋”。

这种一双鞋分黑白两只的现象，古人称之为“黑白两道”。由于商人多姿，喜官商勾结，关系复杂，进而衍生出了现代含义的“黑白两道”。

人间·揭秘

努内与中国农民的异国情缘

母大叫了一声：“哎哟，我的妈呀，这么亲啊！”

干农活儿，手脚磨出了老茧，嘴角上火生出了水泡

努内刚来的时候，不会干农活儿。第一次割麦子，她想出钱去请收割机，婆婆说太费钱了，努内既受不了热，也受不了刺人的麦尖，为此，努内哭了好几回。不能割麦子，不能种地，丈夫给了一个她能干的活：拉犁。因为很沉，努内的肩膀都磨破了皮。有人开玩笑说：“你这洋媳妇是来当牛做马来了。”农闲的时候，邓忠刚就去建筑工地打工。努内觉得丈夫在城里干活挺好，比割麦子要轻松，但有一天，她到工地一看，才知道，干那些活更辛苦。

不会汉语的努内只会说“好”，别人问她，她都回答说“好”。村民们见面打招呼说：“吃了吗？”努内觉得很奇怪，她问邓忠刚：“他们问这话干什么？”

努内不习惯吃炒菜，烤辣椒，有烤糊的味道。努内刚学做中国饭菜，分不清精和白糖，经常在粥里搁味精，蒸馒头的时候，锅里也不添水，大锅都烧红了。蒸的馒头像烤面包，外头是黄的，有的都糊了。还别说，歪打正着，没想到真好吃。起初，她总是把每餐的剩饭剩菜扔掉，现在她知道了，要勤俭持家过日子。

努内努力学着干农活，学着做各种家务、做饭、去河边洗衣服，下田犁地，播种、锄草，割麦子、扒花生，什么都会学，她的手脚磨出了老茧，嘴角上火生出了水泡。

1996年，他们拿出5000元，盖了个大棚养鸡。

因为她的热情好客，咖啡屋日益兴隆。那些村民一见到努内，就上去拥抱她，居然还当着众人亲她一口。在亚美尼亚人看来，这都是很正常的礼节。可邓忠刚还是受不了，亲眼看到自己的女人跟一个俄罗斯男人亲吻，邓忠刚还是感到很不习惯，就在一旁喝闷酒解气。

两个双胞胎女儿，让努内操了不少心。双胞胎女儿一天天长大，邓嘎米拉和邓鲁奇娅姐妹俩经常会缠着爸爸、妈妈，要到城里去，带她们去海边游泳。努内答应女儿，等挣多了钱，一定给她们买电脑，把姐妹俩送进艺术学校去读书。为了使孩子健康成长，让两个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夫妻决定在荣成市区买一套房子，让两个女儿居住。

两个女儿非常漂亮，能歌善舞，老师说，她们有天赋，可以当模特。2013年3月，努内和两个双胞胎女儿被上海电视台“中国达人秀”节目邀请，参加演唱舞蹈活动，努内和两个女儿在台上跳起了拉丁舞蹈，连主持人周立波都称赞跳舞跳得好。

有人问努内：“希望女儿将来在哪里发展？”努内说：“在中国发展。”当问她希望女儿找什么样的对象时，努内看着两个女儿，高兴的说：“希望她们比我过得更好，也在中国找到幸福，找一个像她们爸爸一样的男人。”

努内说：“如果没有爱，我早回国了，这个家是我们的爱情小屋，自己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努内把幸福定义为有爱相随和相扶相伴，无论风雨，还是阳光，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爱人相伴，就是最大的幸福。

阿凤文/图



双胞胎女儿邓嘎米拉和邓鲁奇娅在表演舞蹈

洗衣的地方，就添上水，开始洗衣服。婆婆看见了，去问邓忠刚：“你这个外国媳妇会过日子吗？”努内不知道，这么大的铁锅是做饭的。

面对一贫如洗的新家，心中充满了失落。她坐在炕头，听她从亚美尼亚带来的几盘磁带，一边听，一边哭，后来每到这个穷地方。身居异乡，每当夜深人静时，就想念家乡。努内说：“如果我回去，会伤害很多人。”

邓忠刚回家后，每天要出去干活，留下努内在家照顾孩子。因为两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努内闹出不少笑话。有一次，努内和邓忠刚在家里接吻的时候，被邓忠刚的母亲碰见，邓

忠刚两口子从来不吵架，努内勤快，邓忠刚又体贴，村民对于这桩异国婚姻十分赞赏。

邓忠刚和努内办养鸡场，搭鸡棚，拌饲料，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他们都把鸡舍的粪便送给邻里施肥，遇到村里有人结婚、生孩子，努内会带一筐鸡蛋庆贺，遇到村民到家串门时，努内会拿出水果招待客人。

她与丈夫一起栽树、种菜，一起创造生活，将两个可爱的女儿养大。春天播种时，她拉犁，干农活，她肯出力气；夏天割麦，她挥动镰刀，不辞辛苦；秋天养鸡，不怕劳累；冬天，还要给婆婆做鞋子。有村民问：“你嫁到穷山沟，后悔吗？”努内说：“不后悔，中国话不是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娘扁担扛着走吗。”

自从离开亚美尼亚后，一直没有跟父母联系上。生活太苦了，努内梦想破碎，她想念远在亚美尼亚的亲人。直到5年以后，努内终于拨通了亲人的电话，激动得语无伦次，只叫了几声爸爸、妈妈，就放声大哭起来。

日子越过越好，她感到非常满足

与父母一别多年，思乡心切的怒内经常会仰望天空，默默流泪。因为家里没有电话，路费又贵，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与远方的父母相见。



努内、邓忠刚和双胞胎女儿在家中

中央领导人的退休生活

给了夫人的老家山东省菏泽市用来建立希望小学。

老来得闲发展爱好

退休后闲下来的领导们有了充足的时间运动健身、追求爱好，规律的锻炼、兴趣的发展让他们充满活力。

据万里之子万伯翱撰写的回忆性文章所讲，万里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之子荣乐荣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国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招，获得了世界亚军。万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有些重大的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出席，他们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现在我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退休后不同政事，安享天伦之乐也是田纪云的理念。

2003年退休之后，他说：“领导干部退休，关键是要‘休’。”而他对于“休”的理解是：退休后应安心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争取多活几年，享受天伦之乐。千万不可再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朝政”，对现在的领导人指指点点。要知道，革命就像接力赛跑一样，一人跑一棒，你的一棒跑完了，就坐到一边休息去吧，不要再对跑下一棒的人指手划脚。更应懂得，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而转得更好！”

退休以后，田纪云偶尔会出去和老朋友聚会，吃吃饭，平和而淡泊，“对退下来”显得很坦然。他曾这样说：“年轻的时候努力、拼搏，而到老了，我们要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不要走从学校大门出来进单位、从单位门出来进医院、出了医院的门就去八宝山的路。”

其实，早在1998年八届全国人大届满时，68岁的田纪云就曾向中共提出要退下来，但是没能如愿。“现在好了，多么自由自在，和夫人一起上街买菜，当普通老百姓多好。”他说，“我一直想留点时间给自己，现在退下来了，有时间看书、看电视，另外还写点文章，有回忆纪念的，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也有思考问题的，我现在两天就能写出一篇文章。”

而写文章赚的稿费除了逢年过节用来给工作人员发点慰问外，田纪云自己一分钱也不花，而是全部捐献给老家山东省肥城市做了教育基金。他的其他积蓄也大部分捐给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退休后，万里长期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坚持下去。

热爱桥牌和网球的万里也颇有关书法造诣，在退休后时常挥毫。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热爱书画的不仅是万里，田纪云也一直有收藏书画作品的爱好，比如舒同在1982年给他写的字，黄胄在1984年给他画的画，他都悉心收藏。这种爱好他坚持了20多年，但最近他把自己的藏品捐给了中国美术馆。他希望美术馆把那些书画印成画集，然后他亲自寄给每位书画家一本。“捐出去办个画展让大家都能欣赏。”他说，“那些已经去世的艺术家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不过，田纪云给自己留下了两幅字——那是已故的有“共和国红色掌柜”之称的陈云写

给他的，一幅是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幅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于1998年3月退休，2004年出版《刘华清回忆录》，记录了不少珍贵的历史，其中有许多首次公开披露的历史细节。除却写书，刘华清还喜欢打桥牌。而他的桥牌入门是在解放大西南以后，在重庆看邓小平打桥牌学会的，两人也成了牌友。邓小平逝世后，刘华清坚持着这个习惯，打桥牌成为了他退休后重要的娱乐活动。

老当益壮热心公益

与安享退休生活的万里、刘华清、田纪云不同，也有一些老领导在退休后虽然不直接参政，却在教育、慈善等方面发挥作用。

现已97岁高龄的中共元老、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就是其中一位。

2012年11月7日，中共十八大举行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年逾95岁高龄的中共前领导人宋平当选十八大主席团常委。8日，宋平出席中共十八大开幕会，精神矍铄的

他步伐稳健步入会场，并与各位领导亲切握手。这是宋平自1992年卸去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后第四次当选中共全国党代会主席团常委。

而据媒体报道，退休后的宋平也十分关心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在任职期间就积极促进扶贫工作，而退休后他依然对此念念不忘。今年6月12日，宋平在京出席了一项慈善活动。这项活动号召全国爱心人士投入到助学帮困的事业中来，共同助推贫困失学孩子早日圆梦。而据悉，这是宋平十八大以来首次公开露面，足见他非常关心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事业。

除了参加慈善活动以外，他也积极支持党史修建工作。2013年6月，大型历史文献《共和国日记》首发式暨研讨会在京举行。宋平出席发布会并为《共和国日记》题写序言，并高度评价此书：“为国家记日记，是一种史学创新”。他谦虚，虽然老人老了，但是还可以尽力发挥一些余热。

与宋平同样“闲不住”的还有原中顾委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2004年，他发表

了《我也是个“两头真”》，称“年轻时，面对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该文为他自编的《婴鸣·友声文集自序》，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积极呼吁反腐和党风建设。

康琴

民国时期火车票不能提前订

票，上车肯定能找到一个座位，就像现在的很多长途汽车一样。如果您上车发现没座，那肯定是由售出的车票超出了座位数，属于铁路方面的责任，铁路负责退票，不收手续费。

但是，请您注意，以上情形只存在于理论与书面的规定里。实际上，民国铁路根本没有执行上述规定的具体条件和职业精神，车票通常是敞开卖，根本没考虑实际座位数。我们看很多关于民国人坐火车的记载，尤其是三等车，经常是挤得满满当当，很多旅客别说座位，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你想退票，乘坐下趟列车，可以，但是下趟列车情况还

是如此。旅客耽误不起工夫，只能吃哑巴亏。就算你真去退票，也很有可能退不了。民国的《社会评论》杂志登载了一个事件：民国37年(1948年)，有一个老汉在广深线淦田车站买了张票，车到站后，旅客太多，挤得连缝都几乎没有。他努力了半天，始终无法上车。老汉拿着车票去退票，车票退了，但老汉的车票丢了，老汉去找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打着官腔说：“有什么票退，明天搭车！”说完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门外的老汉，哑口无言，呆若木鸡。挤不上车都无法退票，没座想退票，简直就是做梦！李子明

图为民国时期的铁路春运

